

品读岁月深处那一抹鲜红

编者按: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日。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开天辟地到
新天新地,我们的党成功带领各族人民走过
生灵涂炭的烽火岁月,实现执政为民的伟大
复兴。蓦然回首,弹指一挥间,整整90年。
历史仿佛与我们相隔万里,却又如此贴
近。在东海之滨,三门湾畔。革命的火炬率先
喷薄而出。1928年,一群年轻的革命党人,做
了一件被视为惊世骇俗的事情,写就了“浙

江红旗第一飘”。时光为之惊叹,历史为之永
恒。
站在新时代,我们不禁喟叹,如果没有
当初的风雨历程、没有浴血奋斗,何来今天
的和平富足。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再聆听
父辈们讲那些峥嵘岁月;捧读写满苦难与辉
煌的历史教科书;重走那些洒满烈士鲜血的
红色征途;与革命先烈进行凝视和心灵交
流。
让我们在红色的印记中,在不懈奋斗
中,续写红色的故事,再谱红色的辉煌。



亭旁起义总指挥



包定

□本报记者 郑胤 邱宇

6月24日,我们来到亭旁,来到黄豹山。拾级漫步而上,虽已近黄昏,但天气依旧燥热无比,两侧杂草丛生,显得有些荒凉,不免让人唏嘘。当我们踏上最后一个台阶,只见光芒一片,手卷诗书的包定烈士塑像就静静地站在不远处,落日余晖洒在他身上,泛起阵阵金光,直刺双眼,让人恍惚。
望着那模糊不清的脸,瞬间,内心就变得安详,燥热顿时消散,再慢慢走近塑像,才发现他长得器宇轩昂,眉目清明,更是一脸端庄,手持一卷书,通身一层厚厚的金铜色。
塑像的后面就是他的坟墓了,墓碑上刻有“擎杯闲唱大江东、俯仰徘徊致浓流。飞出一溪溪水鹭,吹来满膝落花风。绿杨堤外渔舟泊,黄豹山前天地空。最是西南遥望好,万家烟火夕阳红。”正是包定《春日坐黄豹山》一诗。
此刻的他安静的,无人打搅,也享受着这太平盛世的别样安宁,但1928年,却是热闹的,26岁的包定用热血为一个伟大的梦想而努力着。

1927年,包定加入共产党,任中共宁海县委员。党的“八·七”会议后,根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以及10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浙江省委“应立即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的精神,11月,包定受县委指派,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回亭旁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5月20日夜。
谷仓岭头。
管容德、包定等人集结了亭旁、海游、珠岙、桑洲武装人员在谷仓岭召开会议。决定建立红军指挥部,确定了起义的纲领口号,推选包定为总指挥,并通知各地做好提前起义的准备工作。

“到了5月23日,包定率领180多个武装农民从丹邱寺出发,直到到家,在任家准备抓捕任升初,攻打任禹玉。结果任禹王家因为墙高,没有攻下,后来转攻打任友端。任友端家大门紧闭,一个红军战士用大斧头劈开大门,由梅奇光小伙子钻进去,把门打开。任友端此时爬墙跑了。大家都非常气愤,就一把火把他的房子烧了。这就是攻打任友端,火烧任家,打响了亭旁起义的第一枪。”亭旁老人包法泽向我们讲述起那一夜发生的故事,历史瞬间被拉回到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夜晚。

25日夜,亭旁地下党的224名武装农民从南溪出发,集结丹邱寺,准备好之后,他们就举起红旗、冒着大雨,高唱红军战歌,向亭旁出发,并和亭旁来的1000多群众集结城隍庙,借群众集结之际,包定上台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建立苏维埃政府。

亭旁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惊慌失措,就在他地盘上,就在他的“蒋委员长”老家的后院,竟然“起火”了!

“围剿!”他密令省民政府、省防军严缉围剿亭旁红军。
亭旁起义失败后,包定奉调天台县委工作,负责民运工作,后任天台县委书记。当时国民政府悬赏1000大洋,要买包定的人头。为便于工作,包定受房东炒芝麻的影响,忍受疼痛,自我毁灭。就这样,一个鲜活的“包麻子”又可以在白天进行工作了。

1929年3月,包定在杭州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省委机关被破坏,他们的信件被国民党当局截获,最终被捕。“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1930年6月22日,时年29岁的包定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前留下最后一首诗。

三门早期党组织领导人之一



蒋如琮

□本报记者 邵韵立 邱宇

“我是家中么子,所以对父亲的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关于父亲的形象很多都是通过母亲的讲述,才在心中勾勒起来的。”三门早期党组织领导人蒋如琮的儿子蒋明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家中一些父亲和一山、柔石、潘元寿等人的老照片以及父亲亲手撰写的自传都在文革时被毁,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父亲留下的东西。”在蒋明诚的眼中,自己和兄弟姐妹是在一个缺乏关爱的家庭中长大的。父亲为大家而抛小家,终年不在家中,回家一次也是匆匆忙忙走了。

蒋如琮,字瑞青,号瑞卿,1898年出生于三门县善善蒋村。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25年参加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1925年9月转学到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时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林泽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戴介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思想激进,崇拜秋白和邵力子。

1926年夏,蒋如琮从上海大学毕业返回家乡。看到家乡落后的面貌,决心为家乡人民做贡献,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9月10日,宁海中学正式开学。此后,他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2月,蒋如琮和林迪生一起来到天台发展党组织,并建立了中共天台特别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在天台、宁海一带活动(三门当时属宁海地区)。

据了解,那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农民运动。在包定、蒋如琮等人的努力下,宁海地方农运工作发展迅速,并得到了浙江省委的重视。1928年5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受省委指派来到宁海,要求尽快展开“武装斗争”,而蒋如琮、包定、包昭华等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表示异议。但最终起义爆发,因条件不成熟而失败。起义领导人或被杀、或被折磨至死、或亡命天涯,蒋如琮先撤至上海,后转赴南洋群岛。

后,蒋如琮历任《光华日报》主笔、甘肃省政府秘书、南

星星火燎原之1928

□本报记者 -郑胤

所有反动机构,并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包定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紧接着,在城隍庙大门口升起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革命委员会向群众出示布告,逮捕反动豪绅。接着,为欢庆新生的红色政权,举行了盛大游行示威活动。这是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发动200余次起义中的一次,也是我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整条亭旁街沸腾了!整个亭旁区沸腾了!整个浙江省沸腾了!

亭旁起义纪念馆距城隍庙很近,转过一个弯,直走几步,就到了,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它显得特别安宁,也特别肃穆。在这片喧嚣中,我跨进了亭旁起义纪念馆。很雅致的一栋房子,木门、石子、浮雕、石像,一切都显得那么古朴淡然,又仿佛神圣不可侵犯。

这曾是亭山小学旧址,是包定上课讲学的地方,如今为承先烈遗志,教育后人,亭山小学重新整修,更名为亭旁起义纪念馆对外开放。纪念馆为两层两进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展厅面积250平方米。大门上方挂“英烈千古”匾额一方;馆内陈列文物除了照片,资料之外,还有大刀、长矛、红旗等实物。这几年,曾经大修过几次,纪念馆也更为规范。

为什么会选择在1928年,为什么会把起义安排在亭旁,为

什么会在蒋介石的老巢发生这样异乎寻常的暴动?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一张张文物资料向我展示了我所想要的一切。
这一年,北伐结束,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而这一年,我党召开“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根据会议精神,浙江省委成立了暴动指挥中心——浙东工农革命委员会,并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

这年3月14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参加,并在会上作全国政治状况的分析报告,提出“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并通过一次次会议和缜密分析,决定把武装暴动安排在宁海。在此大背景下,包定被组织安排回到亭旁,“屈尊”当一名教师也就顺乎自然。

在包定的领导发动下,“大刀和土铳对旧世界作出了无情的批判”,“热血和智慧掌握了历史转折的契机”,“从此,这东海之滨的崇山峻岭,世代赤贫的山夫村民一律染上了红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问亭旁起义的星星之火在哪,谁都不会否认是在南溪。正是因为南溪事件,成为了亭旁暴动的直接导火索。

沿盘山公路,绕好几个圈,终于见到南溪村,在群山环抱中,它显得特静谧,村口竖一块大石碑,书有“亭旁起义首发地”几个大字,颇有气势,绕村小溪潺潺而流,村内则旧房新居交错陈列,依旧保留大量老宅,依稀有几十分80年前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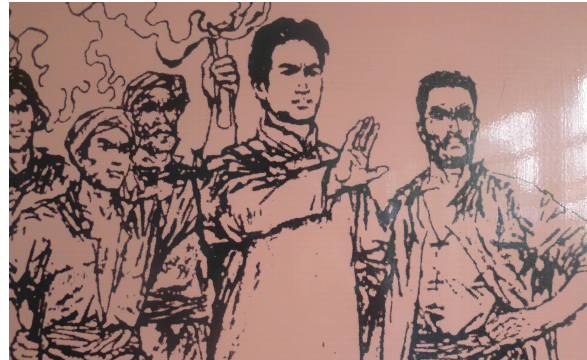
这是个“名人”辈出的村子,曾有受世人瞩目的梅盛,参与亭旁起义的热血汉子梅其彬、梅其广,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三五外婆”……更让人称道的是村里的后人,并未忘却这些“名人”,专门建个历史传统纪念馆,供后人瞻仰,今年还装饰一新。

梅长恕居住的四合院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在农村算得上气派的四合院,青砖石墙,却深锁大门,只依稀看到庭院的布置

和房间的格局。但那子弹穿楼而过、大刀砍中大门的痕迹却完好地保存下来。
梅长恕长期霸占族田60亩,这引起了梅其彬、梅其广的不满,他们要求梅长恕交出这族田,而在1928年清明节这日,族人喝清明酒,村民梅其慎在酒席上当众揭露了梅长恕的这一行为。
梅长恕拔枪怒视,语带威胁,脸上挂着几分嚣张、傲慢;梅其慎却是临危不乱,与其正面而视,脸上带满坚毅、果敢。周边族亲则面面相觑,不敢吱声,空气在瞬间也变得停滞。

这最终引发了次日晚上的围困,我想象着彼时的情景,梅其彬义旗一举,百余受尽苦难的村民,把梅长恕的院子团团围住,时间持续长达二日三夜,这就是亭旁起义的导火线——南溪事件。最终,梅长恕逃遁。而“南溪事件”促使了整个起义计划的提前,成为了革命暴动的导火线。

梅其彬的墓在村边,杉树相伴,青竹遮荫,却正好能看到南溪村全景,我想,他地下有知,看到他为之奋斗的理想,今日终于实现,必然非常开心。



“三五外婆”林玉英

□本报记者 邵韵立

一天,林玉英正在山上打柴,游击队员杨捷在反“围剿”中,腿被国民党军队击伤,一拐一瘸地从山下跑来,眼看山下敌人越逼越近,林玉英急中生智用砍下的柴堆盖在杨捷身上。

当国民党追上山后,没有发现受伤的游击队员,便凶狠地问林玉英,“喂!老太婆,有没有看见刚才有人从这里经过?”林玉英镇定地回答:“有是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对对,就是他,他在哪?”“好像是往那边方向跑了,跑得太急,我也没看清。”说罢,林玉英随手指了一个方向,把敌人引开,最终杨捷成功获救。

现年72岁的南溪老人梅长根告诉记者,“林玉英对待‘三五支队’的每一位战士都很热情真诚。战士们到她家,只要缸里还有半升米,也要烧给战士吃,还不时地去伪乡长梅长乾的家中要粮。”林玉英多次进梅长乾家“借粮”,不仅仅是为了粮食,实际上还做了许多争取梅长乾觉悟的革命思想工作。

据梅长乾妻弟陈莫琦说,民间一直流传着梅长乾“楼上藏着共产党,楼下接待国民党”的说法。那是在1946年,国民党获知亭旁老区游击队的动向后,集结了台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对亭旁老区的游击队进行“围剿”。

几百人包围了当时整个南溪乡,一家一户的进行搜查。当时游击队员们在林玉英等老幼们的掩护下被分散隐蔽南溪的各个偏僻的岩洞、山坳等地方。而“三五支队”的4名主要领导人则躲藏在梅长乾家的阁楼里。

国民党军队搜查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共产党的蛛丝马迹,最后来到了唯一没有被搜查的伪乡长梅长乾的家中。此时,梅长乾的妻子杨玉兰刚刚生完孩子,在家里的二楼坐月子,林玉

英此时作为梅长乾家的保姆负责照顾杨玉兰的生活。

国民党军队在梅长乾家中翻箱倒柜一番寻找,最后把目光瞄向梅长乾的阁楼。正在这危急关头,林玉英镇定地说道:“老总,我家主母在坐月子,进去会对你们不吉利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要进去看看,就在他们踏入屋子的时候,林玉英轻轻地摇醒了熟睡中的孩子,孩子嘹亮的啼哭声打消了国民党军的疑虑,使他们快快退出。

正是林玉英的这种胆大果决,机智英明的性格,多次成功地掩护了游击队的秘密行动,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为最终的解放三门做出巨大贡献。

林玉英最小的儿子梅长田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说,母亲在当时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地下交通员的工作。“当时长石下只有我们一家人,离亭旁镇有10多里,山冈上全是茂密的大松树,母亲就行走在这条曲折难行的小路上,到亭旁赶集,顺便打听各种情报。”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解放三门县城。为了确保战役万无一失,林玉英奉命以探亲的名义进入亭旁,与有意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俞良广取得联系。后来战役进行顺利,敌军指挥员被击毙,分队长俞良广起义成功。由此可见,林玉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交通员。

从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到受人爱戴的“三五外婆”,从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山区女人到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妈妈”,林玉英身上留下了多少岁月痕迹与历史的印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兰善美的呼唤与人性的闪光。